

关于学习“高举总路綫、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紅旗奋
勇前进”专题的学习文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編印

一九五九年十月



2 028 1793 3

市场形势的回顾和展望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在9月14日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我国建国十周年前夕的形势。在经济领域中，在工农业生产继续跃进的同时，市场的形势也是良好的。

拿社会商品零售额来看，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其中历来都占消费品零售总额72%到75%的四十一种主要消费商品的零售额，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这四十一种主要消费商品中，有十二种吃的商品，八种穿的商品，十九种用的商品和两种烧的商品。十二种吃的商品中，关系民生最大的粮食的零售量，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9%，比去年下半年增长了30.9%。其他食用植物油、食盐、酒、茶叶等吃的商品的零售量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的。就拿市场上曾经显得有些紧张的卷烟来说，供应量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今年上半年卷烟的零售量达二百八十多万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6.9%，比去年下半年增长了10.2%，比1950年全年的卷烟零售量还增加了一百一十万箱。八种穿的商品中，除絮棉是农产品外，其他七种都是工业品。这七种工业品今年上半年的零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2%，其中关系民生最大的棉布的零售量增长了35.4%。汗衫、背心、袜子、毛巾、卫生衫裤、棉毛衫裤等针织品的零售量增长了60.4%，一些穿的高级商品的零售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例如，今年上半年绸缎的零售量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呢绒的零售量增长了74.8%。十九种用的商品中，除了电灯泡、手表、机制纸三种略有减少

以外，今年上半年的零售量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的。其中收音机的零售量增长了89.4%，鐘的零售量增长了53.7%，搪瓷口杯、金笔、鋼笔、鉛笔的零售量都增长了一倍以上。就拿市场上曾經显得有些紧张的肥皂和自行車來說，供应量也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今年上半年肥皂的零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8%，自行車的零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5%。市场情况良好不仅表现在商品零售額的增长上面，而且还表现在物价的平稳和商品庫存的增加上面。以1957年12月三十个大中城市四十一種主要消費商品的价格为100，1958年12月是99.1，1959年6月也是99.1。可见，今年6月的物价仍然稳定在去年12月的水平上；如果同前年12月比較，还下降了0.9%。在商品庫存方面，尽管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額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到6月末，国营及合作社营商业商品庫存总量仍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9%。

社会商品零售額的消长、物价的升降、商品庫存的增减，是市场情势好坏的主要标志。我国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額增长了，物价是平稳的，商品庫存增加了，这三方面的情况充分說明我們的市場情况，不是象有些人所說的什么“全面紧张”，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既然“市场全面紧张”是无稽之談，所謂“大跃进搞糟了，造成市场全面紧张”的謬論也就不攻自破了。相反地，今年市场形势的良好，倒是應該归功于大跃进。前面說过，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額比去年同期增长23%，6月末的商品庫存比去年同期增长15.9%。这两方面的增长，共达九十五亿多元人民币。換句話說，同去年同期比較，今年上半年仅是商业部門就多銷了和多存了价值九十五亿多元的商品。这些商品既不是上帝賜与的，也不是魔术师“变”出来的，而是六亿多人

民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創造出来的。这証明大跃进好得很，大跃进使社会产品有了极大的增长，才使社会商品零售額和商品庫存有了相应的增长。硬說“大跃进搞糟了，造成了市场全面紧张”，这不是胡說八道么？至于所謂“人民公社搞糟了，造成了市场全面紧张”，也是恶意的誹謗。相反，今年市场形势的良好，也应该归功于人民公社。由于人民公社比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多种經營的巨大发展。农村公社化之后，农民提供給城市的主要农产品的数量不是減少了，而是大大地增加了。自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整个粮食年度，国家征購的粮食总量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0%。自1958年9月至1959年8月整个棉花生产年度，国家征購的棉花总量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3%。可见，人民公社好得很，人民公社使农业生产和农村多种經營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才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农产品。硬說“人民公社搞糟了，造成了市场全面紧张”，这不也是胡說八道嗎？

当然，我們說市场情况好得很，并不是說一点問題也不曾发生过，或者现在什么問題也沒有了。今年以来，市场上确实有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曾經有些不足。党和政府为此已經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别是党中央6月間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會議以后，情况已經有了显著的改变。可见一小部分商品的暂时紧张，比起总的商品供应量的巨大增长的情况来，充其量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为什么今年以来市场上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有些不足呢？分別看来，城市里猪肉等副食品的供应比过去減少，是因为农民的消费量整个說来是有了相当大的增加；一些日用工业品和小商品在某些地区和某一時間內供应不足，是因为生产的安排上有一些缺点。但是，总起来說，市场上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有些紧张，

主要是因为商品零售額虽然有了极大的增长，仍然赶不上人民購買力增长的需要。人民購買力的巨大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的大跃进，职工人數去年增加得有些过多过快；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化，由于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农民的購買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社会商品零售額有了极大的增长，市场上仍然有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曾經有些不足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反动派造謠說：“中国市场紧张，是因为出口出多了。”这純粹是一派胡言。是的，我国每年都要出口一些农产品和工业品，換回我国不能生产或者生产不足的机器設備和原料（如橡胶、石油、特殊鋼材等）。这是一件好事，是进行大规模的經濟建設所必需的，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今后，只要有可能，我們还要适当地扩大这种对外貿易。但是，我們的出口数量同我們的生产数量比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說是出口出多了，影响了国内市场的供应，是一点根据也沒有的。拿今年粮食和猪肉的出口数量來說，到8月15日为止，出口大米和出口猪肉的总额都不足去年大米产量和去年年底生猪总数的1%。这个数量分到每个人头上，八个半月，每人每月不过餐半碗多飯，猪肉只有小枣那么大的一块。可见，所謂“中国市场紧张，是因为出口出多了”，完全是一种恶毒的污蔑。

在商品零售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仍然赶不上人民購買力的增长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一小部分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飞跃前进中的暫时的局部的现象，同解放前我国人民生活的紧张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解放前，广大工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了上一頓沒有下一頓。这种紧张是掙扎在死亡綫上的紧张。现在，广大人民羣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經有了保障。不但如此，大家还有了余錢，可以吃得更好一

些，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不是说明人民生活降低了，而是说明人民生活提高了。这是每一个在解放前受过生活煎熬的人切身体会到的。因此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个别商品的暂时供应不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完全信赖党和政府能够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一些曾经缺货的日用小商品，很快地就又在市场上大量供应了。

当然，同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至今还是很低的。我们要根本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还要继续进行巨大努力。有人对于我国许多产品的产量很大，而每个人所得的却增加不多，感觉奇怪。这是他们忘记了我国有多少人口，忘记了用除法。譬如，粮食的产量增加一百亿斤，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用六亿五千万一除，平均每人每月只不过分到一斤多粮食。又譬如，生猪的数量增加一千万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一用除法，以每头出肉一百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只不过分到一两多肉。反过来说，尽管每个人增加的消费数量极其有限，用六亿五千万一乘，全国的消费总量却很大。譬如，每人每天多吃二两米，不过是多吃半碗饭，看来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一用乘法，全国每年就多吃掉四百七十四亿斤粮食，约等于我国解放初期粮食总产量的22%。又譬如，每人每年多用一尺布，不够缝一件裤叉，看起来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一用乘法，全国一年就要增加六亿五千万尺布的消费，需要六、七个具有十万枚纱锭、一千台布机的现代化大型纺织厂生产一年才能够供应。

那么，人多是不是就成为一种负担呢？当然不是如此。人多，消费大，这是事实；但是，人多，力量大，这也是事实，并且是更重要的事实。上面所说的乘法和除法，首先应当用来

計算增產和節約，其次才应当用來計算消費。譬如，農業總產值每年增加五十億元，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一用除法，分到每個農民手上，也不過每人每年為國家增產十元財富，是並不难做到的。又譬如，每人每月節省一角錢，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用乘法，全國一年就可以節約七億八千萬元購買力，這又是一個多么大的數字。而且，人多、力量大，還遠遠不是這樣一個數學方法所能估量的。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劲大”“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去年的大躍進就證明，把六億五千萬人民的力量動員起來，對高速度發展國民經濟，可以產生多么巨大的威力！

只要我們善于依靠六億五千萬人民的力量，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就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在工業、農業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在商業方面的情况當然也是如此。市場上一小部分商品的供應不足的情况，經過中央和地方採取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已經有了很大改進。由於各大城市對於副食品執行了“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為輔”的方針，7月份，北京、上海、天津、旅大四個大城市的蔬菜上市量達五億多斤，比6月份增加了將近40%。8月份，市場情况有了更大改進，肉類和食糖的供應量都有了不少增加。這個月，全國肥豬銷售量比7月份增加了30.8%，菜牛銷售量增加了24%，菜羊銷售量增加了38.7%，水產品銷售量增加了11.4%，食糖銷售量增加了41.3%。在日用工業品和小商品方面，生產量和收購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長。8月份，北京、天津、上海、瀋陽、廣州、武漢、西安、重慶八大城市日用小商品的收購總量比7月份增長了31.6%，其中六十六種主要小商品的收購額增長了58.8%。由於生產量和收

購量增加，某些日用工業品和小商品供应有些不足的情况已經有了显著的改变。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各地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都尽一切可能減少了办公杂支和購買各种办公用具的开支，广大人民也踊跃响应政府的号召，把暂时不用的錢儲蓄到銀行里。勤儉建国、勤儉办人民公社、勤儉办一切企业和事业、勤儉持家的风气有了进一步的发扬，今后还将大大地发扬。目前，虽然还有极少数商品在一段時間內供应不足，例如猪肉（因为猪的生长比較慢，母猪怀胎五个月才生小猪，小猪要养八九个月才能长大），但是总的說来，市场上的一小部分商品供应有些不足的情况已經大有改进，今后必然会有更大的改进。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团結一致，繼續跃进。我国伟大的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将在今年內提前实现。我們的现实是美好的，我們的前景更是美好的。讓我們繼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厉行增产节约，爭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經济計劃，为我們伟大祖国和我們每一个人的更加美好的未来，創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吧！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0日社論）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

1958年中国出了許多新鮮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后，涌现了数以百万計的农村公共食堂，受到几亿农民的热烈贊揚。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

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習慣勢力不放的人們，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暫時的缺點，指手划腳地議論起來。事實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批的勞動力，他們却硬說多占用了勞動力；事實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於生產，他們却硬說公共食堂妨礙生產；事實是公共食堂改善了農民生活、方便了多數社員，他們却硬說公共食堂降低了農民生活、對羣眾很不方便。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在少數地區，有些農村工作人員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羣眾堅決不散，或者過後很快又把公共食堂辦起來。就這樣，圍繞着公共食堂，展開了一場鬥爭。

公共食堂“辦不得”嗎？問題根本不是辦得辦不得，廣大羣眾已經自覺自願地在那里辦了，問題是我們對這現象該如何理解，該如何對待。公共食堂不是一個偶然的社會現象，它的產生有深遠的社會歷史根源。我國農民長期遭受封建統治的壓榨剝削，加上水災、旱災、蟲災常常連年襲擊，幾千年間，我國農民不是成千上萬死於災荒，就是大多數經常處於半飢餓狀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據1920年至1936年極不完全的統計，十六年間死於災荒的人口達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人。1942年到1943年，只河南一省餓死的人就有幾百萬。在平常年景，大多數農民也是終年勤勞，不得一飽。能過“糠菜半年糧”的日子，還算是“過得去”的。有許多貧農甚至常常“家無隔夜之糧”，“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吃飯問題對我國農民來說是多麼嚴重的一個問題呵！

解放以後，土地改革以後，粉碎了反動統治和封建主義的枷鎖，農村的生產水平和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初步的提高。可是，一家一戶分散生產，力量還是非常單薄，特別是經不起自然災害的襲擊，農民要經常吃飽吃好還是相當困難。經過共產黨的指引和農民羣眾在鬥爭中的切身體會，人們認識到了，要克

服困难必須依靠集体的力量。土地改革以后，劳动互助运动接着兴起，为了适应集体生产的需要，就有一些农民实行过“合伙做饭”，“集体吃饭”。这就是公共食堂的萌芽。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普遍成立高级社以后，生产集体化的规模扩大了，集体生产和分散吃饭的矛盾就更尖锐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许多农业社里办了农忙食堂。到了1958年夏季，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农忙食堂更象雨后春笋一般处处兴起；并且有一些开始转为常年的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适当范围的生活集体化成为广大群众普遍的要求，公共食堂这种新兴的生活福利组织，很短期间就在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普遍地建立起来。今年上半年，各地的公共食堂经过整顿，在总结过去经验、因地制宜的基础上，贯彻实行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大多数都巩固起来了。据调查，经过整顿以后，河南省共有公共食堂三十二万个，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四川农村有五十九万多个公共食堂，安徽农村有二十万五千个公共食堂，上海市郊各县有两万多个公共食堂。北京市郊区有七千多个公共食堂，最近还在不断增加；此外，还有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农村公共食堂都办得比较多、比较好。其它各省和自治区的农村公共食堂，也都采取了各种适应当地条件的措施而日见巩固。广大群众不但办了公共食堂，而且办得很好，将来还会办得更好。一些被解散的食堂又由群众纷纷恢复了起来。“办不得”论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眼见得是只有破产一条路了！

公共食堂究竟是不是节约了劳动力，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呢？事实是，公共食堂一成立，就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动力，使她们有可能直接投入农业生产、副业生产或者工业生产。据河南省调查，全省农村一千零几十万户，过去有一千万妇女常

年忙于家务劳动，有的完全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只能参加部分的农业劳动。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之后，全省只有一百二十万个炊事员做饭，加上其他服务人员，也不到二百万人（将来这部分人力还可以节约），再加上托儿所、幼儿园占用一部分劳动力，至少还可以节省六百多万个劳动力。再以福建省来说，该省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以前就是比较多的。可是，福建将乐县在办公共食堂以前，虽经一再动员，妇女经常下田劳动的也不过五千多人。办公共食堂以后，这个县的妇女经常下田劳动的达到一万二千多人。因此，全县的农事活动普遍比去年提早了一个节令。办食堂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动力，而且也使全体在食堂吃饭的男劳动力出工整齐一致。农忙时食堂还把饭送到田边，更加节省了农民来回跑路的时间，减轻了他们的劳累，保证了他们的休息。因此，这个县各个公社的工效，普遍提高20%—30%，今年的晚秋作物能普遍多锄一次草、多追一次肥。

公共食堂是不是改善了社员生活呢？这是肯定无疑的。据河南遂平等十六个县四十六个公共食堂4月分的统计，平均每人消费粮食三十三斤（其中包括薯类五斤半），菜二十斤，全月伙食费用合计四元多。这个生活水平，同过去当地同一时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比较起来，显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地社员最满意的是办了食堂以后生活的稳定。许多社员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每天能吃到一斤粮食，又是白馍又是菜，从前想也不敢想！当然，这个生活水平还不高。但是我们不能用城市生活水平去比，更不能用经济比我们发达的国家去比，而只能用过去来比，用大多数农民单独起伙的情况来比。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确是保证了农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将保证它的继续改善。

公共食堂是不是使社員在生活上感到不方便、不自由呢？如果是那樣，食堂是不會維持下去的。的確有些食堂在開始的時候由於缺乏經驗，曾經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在整社以後，各地公共食堂都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各人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余全部歸己”的辦法。同時，採取了各種靈活的方式：可以常年或者只是農忙的時候在食堂吃；可以全家或者只是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在食堂吃；可以全天或者只選一頓、兩頓在食堂吃；可以主食、副食都由食堂供應，也可以只在食堂定主食或副食；可以在食堂里吃，也可以打回家去吃。有些地方還實行“一堂多灶”，並設立小賣部，誰願意吃哪一種就吃哪一種。總之，盡量給社員以方便，使大家再也不必為柴米油鹽操心。正如四川武勝縣一些農民的歌唱所說：“往日收工回家來，先挑水來後拿柴；眼看太陽偏西坡，我還在家出不來。如今吃飯不用忙，收工過後進食堂；只要出工鑼聲響，無牽無挂把工上。”難道這就叫做對社員不方便，不自由嗎？跟攻擊公共食堂“消滅了家庭生活”的人們說的恰恰相反，公共食堂不但不排斥家庭生活，而且帶給許多農民家庭更大的幸福。入了食堂，一家人仍然可以聚在食堂里一桌吃飯，也可以打回家里一桌吃飯，而他們是吃得更好了，更方便了。而且，這減少多少家庭中夫妻、婆媳、妯娌、姑嫂之間的糾紛和怨恨！婦女們解脫了鍋台、碾台、炕台的束縛，參加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就是男社員，也有了更多的機會過集體的政生活、文化生活。大家在集體生活中眼界日益開闊，思想不斷進步，心情就更加愉快。公共食堂在改進飯食衛生方面也有很好的條件。社員不在家裏做飯，住的地方也容易清潔了。

公共食堂是不是會浪費糧食和其它物資呢？初辦的時候，有些食堂缺少經驗，沒有很好地統籌安排，又喜逢大丰收，確

曾多吃了一些糧食和副食品，有的也多用了一些燃料。這是難免的。各地在整社的過程中，採取了各種具體的措施，建立了必要的制度，飯菜實行供給制的範圍，也由各地方、各公社、各生產隊、各生產小隊根據具體條件和具體計算自行規定，這種浪費現象已經迅速地消除了。食堂的規模，都按照利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作了調整。食堂是羣眾性的集體福利事業；正象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別的集體事業一樣，它比個體經營有極大的優越性。它可以用集體的力、集體的智慧來克服各種困難，可以創造越來越多的條件來把羣眾的生活安排得又好又省。現在，各地食堂都注意了經濟核算和物資的綜合利用，按照農忙農閑，熱天冷天、過年過節的不同需要，有計劃地使用糧食、副食和燃料。隨着管理人員、炊事人員和其他服務人員的日益熟練，公共食堂不但可以更多地節約勞動力，還可以節約不少物資。據河南省七千多公共食堂統計，它們在最近三個月內就節約了糧食七十八萬多斤。據一些地區調查，凡是辦得好的公共食堂，同分散做飯的時候相比，燃料可以節約30%以上；每年添置炊具的費用，可以節約60%左右。很多食堂由於節約，有了贏餘，還養豬，養羊，種菜，腌菜，增加了食堂飯菜的花色品種，增加了副食品的供應。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公共食堂的旺盛的生命力和無限美好的前途。它將隨着人民公社生產的發展，隨着社員收入的增加，而日益成為提高羣眾物質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

共產主義者從來主張徹底解放婦女，使婦女同男子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一同建設美好的社會，一同創造幸福的生活。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首先要消滅階級之外，還要逐步創造條件，做到家務勞動社會化。“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中工作僅占有她們很少工夫

的时候，才有可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只有在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列宁：“伟大的创举”）现在，我国农村妇女开始“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了，“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了，社会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的多年理想，虽然还不能完全变成现实，总是开始变成现实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大喜事！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口口声声讲群众利益，甚至讲共产主义，可是对于这件解放广大妇女劳动力、促进家务社会化的事业不但没有鼓掌欢迎，热烈支持，却在一旁大施攻击。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尽管也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何尝有半点共产主义的气味！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农民群众大量举办的公共食堂，是热情支持的。在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满腔热情地对办好公共食堂的目标和方法，作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规定。它说：“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养鸡、养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含热量和营养成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的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诚然，这些要求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但是它们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逐步实现。新生的事物必然会碰到一些困难，必然会发生一些问题。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在新生事物发展的过程中，

碰到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發生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革命者對待新生的事物的唯一正確的態度是積極地支持它克服困難，熱情地幫助它解決問題，而決不應該對它採取冷淡無情的態度。1919年6月，列寧說過，共產黨員必須關心共產主義的幼芽。他說：“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兒園是這些幼芽的標本，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能夠解放婦女，減少和消除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他還說：不管情況是怎樣困難，“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支持下，共產主義的幼芽不會夭折，而一定會茁壯地成長起來，發展成為完全的共產主義”。看，列寧對於公共食堂這樣的共產主義幼芽是採取多么堅定多么熱情的態度！在我國，公共食堂已經基本上普及於全國農村，辦好的條件完全具備。人們有什麼理由不對這些新興的大有前途的事業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呢？

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反動分子借我國的公共食堂為題而發出的種種謾罵，這是完全不足為奇的。“消滅家庭”之類的鬼話，從共產主義剛在世界上出現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及其奴仆們就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這種誣蔑已經作了最有力的駁斥。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公共食堂的造謠誣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們的無恥和無知之外，還能再有什麼呢？公共食堂本不是中國農民的發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是早就有了公共食堂嗎？不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辦公共食堂是為了賺錢，為了剝削勞動人民。我們農村中的公共食堂儘管還很簡陋，卻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它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這就比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共食堂高出百倍。帝國主義者採用各種借口咒罵我們，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粉碎了他們加於中國人民的枷鎖，永遠取消了他們

掠夺中国人民的自由，永远要脱离他们而过自己的越来越好的生活。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中国发生的“使我们目瞪口呆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只不过是为主要任务——生产——服务的需要的改变。生产，生产得更多、更好、更快！”（巴黎“世界报”1958年9月27日刊载的纪兰的报道）。显然，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

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话是说对了。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它的公共食堂，都属于这一类事情。我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定会越办越好。在现阶段，它们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在将来，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幼芽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2日社论）

人民公社光芒万丈

——驳斥“人民公社搞早了、

搞糟了”的謬論

賈 启 允

人民公社是我国广大劳动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光輝照耀下，在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产生的。这是我国几亿农民伟大意志的表现，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繼續和发展，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的伟大創举。现在，国内外敌对分子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恶毒的誣蔑，說：“人民公社是少数人轟起来的”，“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等。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事实有力地粉碎了这种謬論。

人民公社是否由少数人轟起来的呢？是否搞早了呢？

我国农村經過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大兴水利运动中，很多地区都发生了超越社界、乡界以至县界的共产主义的大协作，随之即出现了并大社的现象。例如河南省在1958年初，农业社为四万九千个，到1958年6月合并为三万七千个。1958年初全国共有农业社七十八万九千个，到1958年6月合并为七十四万一千个。

大兴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产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为了兴修水利，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同时，有了水利就需要增施肥料，接着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工具体改